

黄国信
温春来

◎ 主编

西樵历史研究

——
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成果集
——

CHINA KNOWLEDGE
中国知识

黄国信
温春来

◎ 主编

西樵历史研究

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成果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樵历史研究: 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成果集 /
黄国信, 温春来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6.5

ISBN 978-7-5495-7974-7

I. ①西… II. ①黄…②温… III. ①佛山市—
地方史—研究 IV. ①K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662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 字数: 200 千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作为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有着长期田野调查传统的机构,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展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2008年以来,我系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推广到教学之中,让学生在历史现场阅读与研究历史,实践陈寅恪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同情之理解”理念,希冀大幅度提升教学效果。为了方便与同仁交流,我们一直想编著两本书,一本结合具体的田野点,深入阐述本系田野实践教学的理念与方法,一本展示该田野点的实际教学效果,两书相辅相成,作为我们今后的基本教材。本书即后者的体现,关于前者,我们编有《历史学田野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同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有着广泛田野经验的历史学者而言,停留在书斋里研究历史,会造成对历史的许多误读。此外,乡民的某些生活常识,对于从书斋里走出来的学者,说不定就意味着石破天惊的学术新发现。走向历史田野,在田野中解读文献,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式。对此,我们在《历史学田野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导言中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仅对教学方式与田野点做一些说明。

我们的田野教学实践,主要安排在大学二年级的短学期。在这一学期里,首先展开一至两周的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了解田野实践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然后由任课老师和助教带领学生前往相关调查

点,进行实践教学。实践阶段结束之后,学生回校分组讨论、撰写调查报告。具体而言,田野实践课程的安排是:先由承担课程的四五位老师用一两周时间,讲授族谱、契约、碑刻、传说故事和宗教科仪书等民间文献的解读方法以及进行实地考察应注意的事项,并组织博士生助教与学生进行互动讨论,加深学生对在历史现场阅读历史文献的认识。随后,发放由任课老师与助教编定的田野实践读本,带领学生前往本系教学实践基地实地考察、研究学习。在基地,学生每天上午在教师和助教指导下考察当地自然环境以及具有较深文化积淀的祠堂、庙宇、民居等,搜集文献,访谈百姓。下午将学生分成四五个小组,由助教指导学生阅读与当天考察有关的田野读本中的材料,将田野中所获取的信息和田野读本中的历史材料结合起来。晚上,召开讨论会,分组发言,报告白天的收获和小组讨论的成果,由课程老师对发言作进一步的指导。最后一天,对整个实践教学进行总结。

我们的田野读本,主要内容包括考察地点的自然地理材料,相关的正史、政书、地方志资料,祠堂、庙宇、码头、渡口等地的碑刻,有关家族的族谱、契约,以及当地人的文集、账本、日记等资料。一般而言,我们会将这些材料按照考察时间进行排序,以便学生阅读和讨论。每天的考察,则要求学生进入考察点,在现场考察、观看、阅读相关材料,以及寻找当地百姓进行访谈,将访谈与阅读、观察相结合,理解当地所发生的历史。

每天下午的讨论,我们要求助教带领学生分组全面总结当天考察的所见所闻、所访所谈,并且完整阅读田野读本中当天必须读完的所有材料。在此基础上,由学生结合文献与考察所见,初步总结考察地的历史发展脉络。当天晚上,则集中所有选课同学,发表各组的不同观点,共同建构当地的历史脉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强调的是历史学最本位的技术手段,即按照文本(含田野读本中的材料和考察所发现的口述与实物材料)形成的时间来重新排比材料,进而分析文本所呈现的历史脉络。并且强调,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人,分析

时,一定要重视考察点不同的人在相关历史文本形成过程中,以及在当地的历史脉络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到了整个课程和考察结束前夕,我们再组织学生对所有考察点的历史进行综合分析。此时,按照文本形成时间来分析材料的做法,不仅针对某个具体的考察点,还要将所有考察点的文本打乱进行重新排列,从而在几个考察点已经形成的具体历史脉络基础上,找出整个课程所有考察点的各个历史环节之间的关系,进而把握这一区域的总体历史脉络。经过这样的讨论,学生一般都能建构起考察点的历史脉络与历史逻辑。这样的建构,比起坐在图书馆建构起来的历史脉络,常常更能发现当地历史的“深意”,也就是如果不进入田野就比较难发现、比较难理解的历史。

我们的田野教学基地在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定点于西樵,有两个原因。首先,凭借西樵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完美实现上述教学理念。西樵镇因西樵山而得名,西樵山是岭南人文名山,她从新石器时代至今积淀了深厚的文化财富,成为岭南文化的精萃之一。大约六千年前,这里已是与山西鹅毛口遗址并列的南北两大石器制造场之一,考古学家称之为“珠江文明的灯塔”。明代,西樵因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一批著名学者在此结庐讲学,成为鼎盛一时的理学名山,引起了包括王阳明在内的思想大家的关注,被时人誉为“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晚清之世,神州陵夷,康有为、陈启沅等西樵乡贤,在思想、实业等方面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引领了近代中国革新的方向。改革开放之初,西樵再得风气之先。这里,人文积淀深厚,更有大量官方、民间文献留存,包括文集、碑刻、族谱、契约、账本、日记等;而如祠堂、庙宇、码头、渡口及著名考古遗址等甚具探析内涵的丰富历史遗存亦时刻启发着调研工作。另外,大量沿着近代化历程走来的各色乡人长者,均为历史碎片的拾掇提供着便利,西樵无疑是适合从事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理想地点。其次,我们在西樵兼具了天时、地利与人和。2009年,我们与西樵镇政府开始接触,决定编辑一套多达300余种书籍的“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以

发掘、呈现西樵深厚、复杂的历史文化底蕴,西樵田野实践教学基地借此而成立。两年后,中山大学与南海区政府在西樵山共建了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成立伊始,历史系便与岭南文化研究院、西樵镇政府达成了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的意向,得到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经费支持,成绩斐然。2013年、2014年,“中山大学历史学西樵实践教学基地”先后入选成为广东省和教育部的大学生田野实践教学基地。

经过多年在西樵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基地的实践教学,我们的学生交出了大量的实践调研报告,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恰逢一直重视此项教学工作的教育部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对我们的实践教学提供了经费支持,我们不揣浅陋,选择了较能体现该地实践教学成果的八篇优秀论文,辑成此书,以“丑媳妇终须见公婆”之心,公之于众,诚望学界垂阅,审视我们的教学成果。

这八篇实践教学成果的作者,本科时,均就读于中山大学,毕业后,分别选择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学校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其中有一位作者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在国内著名高校、博物馆等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八篇文章,便是他们在西樵参与实践教学所取得的成果,研究区域均为西樵,是以本书命名为“西樵历史研究”,但是,调研虽于西樵之内,而成果所关心之问题却远在西樵之外。李晓龙的《清代桑园围的基主业户与基层社会——以西樵海舟堡为例》一文,关心的是水利系统与地方社会文化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在这一互动中的演变过程。桑园围是珠江三角洲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西樵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晓龙指出,桑园围地处西江、北江下游,水患频繁。历史上桑园围居民不得不一直与水进行斗争,并形成了一套围基修筑、管理的机制。该机制中最重要的是基主业户制度。基主业户即在桑园围基围上有份的业主,负有经管某一基段的义务,而该基段及附近的地利所得归基主所有。

该制度在桑园围地区不仅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有清代以来官府、士绅、民众参与互动引发的制度演变的影响,结果不仅强化了其作为基层治水单位的基础,同时也赋予了其社会纽带的职能,使其反过来影响着地方社会秩序,促使宗族之间的联合在桑园围基层社会中逐渐凸显出来。而跨宗族的神庙祭祀因此形成和发展,逐步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围基的基层管理制度最终透过百姓熟悉的信仰仪式内化于社区的日常生活。

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因为性别史的原因,早已深得学术界关注。学界研究侧重于顺德地区,徐靖捷则怀着抢救性记录的心态,访问了西樵的一批自梳女,写出了《“家无自梳不富”——南海区西樵镇自梳女的田野调查》一文。由于一般关于自梳女研究的问题意识,常来自性别史,而性别史研究受女权主义影响至深。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之下,自梳女这一现象,常常被解释为女性对旧制度的反抗。但是,在走访了十多位耄耋鲐背的自梳女后,作者发现她们当年自梳,跟反抗男权或者反抗封建,基本上没有关系。这些女性自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清代中期以后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产模式发展,女性劳动力可以为家庭带来额外的收入,珠江三角洲长期流行“家无自梳不富”的俗语,因此,许多女性都在家庭的压力下选择了“自梳”的道路。二是传统时期的“金兰会”,成为监督女性“守身如玉”的一种社会压力。三是当地风俗,弟妹结婚时,如果姐姐还没有结婚,姐姐就需要“自梳”,以免貽误弟妹的婚事。如果妹妹已嫁,姐姐就不能出嫁。这样看来,这些自梳女,反而是因为“男权”或“封建”而自梳。

任建敏的《从西樵山“宝峰寺遗址”探索历史与传说》则以西樵山的一段历史探索了民间传说的形成过程。西樵山是明代的理学名山,嘉靖年间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名贤所建立的四大书院鼎盛一时。景观上,明中叶以前,山上有名刹宝峰寺,到嘉靖初则变成霍韬的四峰书院。而历史记忆上,霍韬与宝峰寺的故事也在逐渐演变。清初四峰书院倾圮以后,霍韬强占宝峰寺的说法在不断加强,最晚到

民国年间,这一遗址已经被当地人视为霍韬强占宝峰寺的证据。而这一印象,也随着西樵山风景名胜区把四峰书院的遗迹标注为“宝峰寺遗址”而成为当地的一段历史记忆,显示出坐落在西樵山中部茶花园(宝林洞)中的“宝峰寺遗址”背后的历史演变。

陈海立从西樵田野调查出发,撰写了《商品性农业的投资困境——基于西樵田野调查的微观经济分析(1800—1937)》一文,揭示出商品性农业不能自发地催生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键原因在于“投资困境”的问题,探讨了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重大而核心的问题。他指出晚清民国时期西樵的桑基鱼塘农业的发展个案表明,产权和收益权是清晰的,而且市场条件也足以保证产品、甚至生产资料的市场化。即便如此,因为投资回报率并不高,且回报周期过长,商品性农业并不完全适合资本的积累。而另一方面,其经营者是趋于并非完全“经济理性”的宗族,则是此投资困境的一个侧面。这一成果提示我们,对商品性农业发展的研究,需要重视其投资理性与投资回报等问题。

西樵是近代以来的著名武术之乡,其中黄飞鸿的故事随着影视和文学作品的传播而闻名中外。黎俊忻的《晚清民国时期的西樵武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文献的记载和作者自己较长时间在西樵田野调查所得文字和口碑资料,生动地呈现了西樵在晚清民国时期的部分武术家和相关事件。作者指出,西樵是岭南武术地图中一个很重要的地区,与广东许多村镇相类,西樵在帝国晚期由于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量减弱,有不少武装革命、团练活动、地区冲突发生,使本地武风鼎盛。清末民国有大量武术名家出生或活跃于西樵地区,他们的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岭南拳种的流传及武术团体活动的印迹。由于西樵独特的山区自然环境,长久的商品经济活动及随之而来的行业公会组织,以及与周边地区及东南亚等地华埠的密切联系,西樵武术传播呈现出其自身特点。

珠三角地区是粤剧粤曲艺术重镇,不少粤剧粤曲名伶、唱家诞生

于此,香港红伶任剑辉便是其一。西樵的粤剧粤曲文化,在粤艺流行的珠三角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并因其内发的独特性吸引着研究者。而无论是在西樵的文化宣传抑或乡人自诩中,任剑辉的被引用率均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宋哲文《模糊的故影——任剑辉与西樵故里之关系略探》讨论了著名粤剧艺术家任剑辉这一符号在故乡的意义,及其二者的关系。经过在西樵的长期访谈调查,作者发现西樵人热衷于提及“任剑辉”,却极少将其奉为最爱。“任剑辉”这个被放大的名字背后是诸多模糊不清、错乱混淆的了解与记忆。她发现在西樵粤剧粤曲的相关调研中,籍属于此的香港红伶任剑辉犹如引领穿梭的“灵感”,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所代表的艺术语境与“西樵”碰撞交互,时刻提供着新的思考空间。因此,她从文化符号的视角出发,指出“任剑辉与西樵”这一有趣的关联既提醒着我们谨慎地处理名人与其故里间的关系,又提供了更多可供探讨的视角。以二者为引线来看省港澳艺之分途是一个甚具启发的视角,而这一角度反过来又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任剑辉与其故里之“亲疏”。她认为,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急于承认任氏的成就与价值的同时,现今的西樵人既缺乏深入了解其人其事的兴趣,更缺乏真正理解其艺术内涵的语境,他们对任剑辉的追认更多时候不过是不可抗拒的名气与魅力对平凡小民的征服。她的研究,揭示了当今地方文化建设中非常值得重视的如何将文化符号内化的问题。

张燕庄的文章则对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生产行业——丝织业进行研究,这一行业的历史关乎中国国际贸易与近代化等重大问题。她经过长期的访谈与调查,并对读相关文献,撰写出《技术与记忆——基于西樵缫丝业口述文本的分析》一文,挑战了既有的蚕桑丝织技术史的写作模式。她认为,以前的研究往往在技术的“新/旧”“先进/落后”框架下予以论述,强调新旧之间单线的发展模式。但西樵的历史表明,不同缫丝技术长期并存,各自占有其市场份额。而在缫丝工人的记忆中,工厂制度、社会关系而非单一

技术元素,也同时让他们产生了对近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舞狮是西樵一项富有狂欢色彩,甚具地方文化情味的民间活动。周肖在西樵访问了一批舞狮名家,发现了舞狮与武术之间的关系。她用比较原始的口述记录和分析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她的《西樵“武家”舞狮寻访记》。本文通过若干篇对黄飞鸿故里,即广东著名武术之乡——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相关武家的田野访谈记录,呈现一段与舞狮及武术相关的历史。作者在访谈录之后附上相应的访问后记,记录访谈情境及每次访谈中的感想。文章反映了武家习武的经历,以及他们的成长史和家庭史。作者通过多层次的视角去观察他们的生活,更清晰地体现了舞狮、武术在口述者一生中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系列在田野调查实践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研读的成果,正如前文所述,虽被组合命题为“西樵历史研究”,却远非目光限于西樵的琐屑调查。这些文章虽仍略显幼稚,但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不少已经直达该问题的学术前沿。因此,我们愿意出版这些文章,以体现我们的田野教学风格及其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同学们在田野调查中的某些感受,让我们深为感动。记得有一位作者曾经告诉我们,他们去访谈和调查,是抱着一种“抢救式”的心态去的,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时时刻刻地感觉到,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是和生命赛跑”,他们常常在发现一位重要采访对象,奔袭过去时,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但是,我们的同学们还是如此执着,终于通过采访,结合历史文献,写出了一篇篇具有学术意义的文章。我们选择其中的八篇,结成文集出版,希望得到历史学教学界的批评与讨论。是为序。

黄国信 温春来

2015年10月6日

目 录

1	序言
1	清代桑园围的基主业户与基层社会——以西樵海舟堡为例 / 李晓龙
39	“家无自梳不富”——南海区西樵镇自梳女的田野调查 / 徐靖捷
64	从西樵山“宝峰寺遗址”探索历史与传说 / 任建敏
89	商品性农业的投资困境——基于西樵田野调查的微观经济 分析(1800—1937) / 陈海立
125	晚清民国时期的西樵武术 / 黎俊忻
166	模糊的故影——任剑辉与西樵故里之关系略探 / 宋哲文
190	技术与记忆——基于西樵缫丝业口述文本的分析 / 张燕庄
220	西樵“武家”舞狮寻访记 / 周肖

清代桑园围的基主业户与基层社会

——以西樵海舟堡为例

李晓龙

内容提要：水利系统与地方社会文化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水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桑园围地处西江、北江下游，水患频繁。历史上桑园围居民不得不一直与水进行斗争，并形成了一套围基修筑、管理的机制。作为更贴近基层水利的基主业户制度，在桑园围地区不仅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有清代以来官府、士绅、民众参与互动引发的制度演变的影响。这一过程中，基主业户不仅被强化了作为基层治水单位的基础，同时也被赋予了社会纽带的职能，反过来影响着地方社会秩序。“基主业户”专管专修以及基主业户为主导的基段共同体，促使宗族之间的联合在桑园围基层社会中逐渐凸显出来。跨宗族的神庙祭祀形成和发展，逐步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围基的基层管理制度最终透过百姓熟悉的信仰仪式内化于社区的日常生活。

关键词：水利社会 桑园围 西樵 基主业户

用水和治水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大重要问题。魏特夫将“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联系起来，认为由于“治水农业”社会的水

利建设和管理工程巨大,需要高度集中组织和强势控制才能完成,导致“建立了庞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① 人类学家巴博德以台湾乡村的水利调查为例的研究,开启了水利史研究的另一个视角,他试图回答“一个社区的水利系统怎样影响到该地社会文化的模式”。他认为,不同的灌溉模式能导致重要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变迁。^② 在这个脉络下,日本学界兴起“水利共同体”说,中国学界也提出“通过水利看社会”。

在水利史的讨论中,华南是一个重要的区域。而桑园围这个被誉为“粤东粮命最大之区”的地方,自然也备受关注。^③ 森田明侧重于桑园围总局,主要考察桑园围的管理组织的形成、运营,管理的财源及管理组织的变质。^④ 唐富满、袁海燕、程洁虹等则从不同的方面讨论了珠江三角洲堤围水利发展及围内水利管理系统的演变。^⑤

森田明在他的著作中总结称:“水利灌溉、治水等事业无法单独实施,它们必须与历史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密切配合,方能进行。”^⑥ 近几年来,我们在西樵地区的田野调查中,也深切感受到西樵乡间的历史景观、社会组织都深深刻着治水的烙印,普通百姓的生活亦受此影响。我们也注意到,在围董会之外,更深

① [美]卡尔·A·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② Burton Pasternak, "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③ 参见佛山市水电局、南海县水电局、顺德县水电局:《桑园围的发展过程和重大成就》,载《桑园围暨珠江三角洲水利史讨论会论文集》;《珠江三角洲堤围和围垦的历史发展概括》,载《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王绍良:《试析桑园围顺德段从开敞到封闭的演变》,载《桑园围暨珠江三角洲水利史讨论会论文集》,第17—22页;廖肇兴:《修筑桑园围的历史背景及管筑人物考》,载《桑园围暨珠江三角洲水利史讨论会论文集》,第62—63页。

④ [日]森田明:《広東における田基の水利組織——桑園圍を中心として》,《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

⑤ 唐富满、周兴楼:《试论珠江三角洲的围董及围董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袁海燕:《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堤围管理与基层权力体系——以景福围为中心》,《农业考古》2009年第4期;袁海燕、林有恒:《清代珠江三角洲堤围管理与社会变迁——以鹤山古劳围为例》,《广东史志》2014年第2期;程洁虹:《水利发展与祠庙系统的演变——以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园围为中心》,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⑥ [日]森田明著,郑樑生译:《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第5—6页。

入到水利基层管理的制度——基主业户可能与地方社会有着更密切的关联。^① 片山刚虽然注意到基主业户,但他主要是从户籍和赋役制度的层面考察。^② 衷海燕对景福围祠庙系统、程洁虹对桑园围河神庙等的研究,也更多地从“官”的层面解读信仰仪式与基围社区间的关系。我们认为,作为更基层的基主业户制度,在桑园围地区不仅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有清代以来官府、士绅、民众参与的互动及其带来的制度演变的影响,围基的基层管理制度最终透过百姓熟悉的信仰仪式内化于社区的日常生活。本文希望以桑园围海舟堡为例,在梳理基主业户职能演变的基础上,讨论基主业户制度的内涵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一、海舟堡的基段与基主业户

桑园围地处珠江支流之北江、西江下游,“围内烟户数十万家,田地千五百余顷”,其地“居西北江下游,实为泽国,夏秋江潦骤涨,县属居民辄苦河鱼之疾”。^③ 所以,历史上桑园围最大的问题就是水患,“每当夏令,潦水骤涨,汹涌震荡,全赖围基保障得之。”^④“当五六月西、北江潦水涨发,怒涛湍激,大为堤害,若不合力并心,时加整理,嗷嗷万姓靡有宁居。”^⑤

海舟堡是桑园围十四堡之一,位于桑园围西部,濒临西海。根据《桑园围总志》的记载,海舟堡内的村庄,包括李村乡、麦村乡、海

① 唐富满也曾指出,围董会的权威始终未能深入到水利基层管理中去。参见唐富满、周兴禄《试论珠江三角洲的围董及围董会》。

② [日]片山刚:《珠江デルタ桑園圍の構造と治水組織——清代乾隆年間~民國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93年第3期。

③ (道光)《南海县志》,卷16,《江防略一·基段》,第4页。

④ 《修筑全围记》,(同治)《桑园围总志》,卷1,《甲寅通修志》,第22页。

⑤ (光绪)《重辑桑园围志》,卷2,《图说》,第16页。

舟乡、田心乡、新涌尾乡、槎潭乡、新村、沙尾村和良田村等。如果对应到今天南海区西樵镇的行政区划上,则李村包括了太平行政村的李村和三门村;海舟村又名滘边村,^①它和麦村现同属于海舟行政村;田心村、新涌尾村等,现在属于田心行政村。

海舟堡围基是全国受水患冲击影响最大的一段。海舟堡地处西江急流下游,中有太平沙阻隔,加重了西基受冲的水势,历来有西基水患为甚之说。这段围基的最早修筑时间,我们无法确定。相传桑园围围基开筑于宋代,而根据万历《南海县志》的记载,当时的海舟堡围基“一千七百五十三丈,护田一百九十顷”,^②可见海舟堡围基至迟应该不晚于万历年间就已经修筑起来。

清代的海舟堡围基,上起先登堡,下迄镇涌堡,全长一千三百六十四丈一尺。^③据《桑园围总志·海舟堡围基图》记载:

海舟堡围基受太平沙水激射最烈。甲寅黎余石一段旧决口。丁丑、癸巳十二户三丫基二段旧决口,圈筑入里,与水让地,基身高厚似可无虞。惟天后庙前,丁丑决口,下毗连锁涌,禾义基界上三处基段顶冲最险,内填塞北湖,外筑三大石坝以杀水势,可保巩固。然杀水石坝非长三十丈,高与基并,不能与太平沙角力,照石坝式乘并估值每坝约需银五六七八万两不等,诚非可猝办。^④

太平沙位于桑园围之西,正当江水之冲。受江心岛太平沙的影

① 海舟村梁家的族谱中提到,梁氏的始祖“由南雄珠玑巷徙居于广州府南海县江涌司海洲堡海洲乡,又名滘边乡澄清里,建设祠堂,永承禋祀”。(《梁仁秀堂系谱总志》,光绪五年抄本,第1页。)

② 《万历》《南海县志》,卷1,《地理志·圩岸》,第18页。

③ 《光绪》《广州府志》,卷69,《建置略》,第20页。

④ 《同治》《桑园围总志》,卷7,《癸巳岁修志》,第22页。

响,桑园围西部的太平至南村一带,每到夏天潦水泛滥时候,大水每每冲决沿江围基,多致缺口,人畜禾田受损严重。因此,维护西基成为桑园围水患防御的重点之一。海舟堡围基更是桑园围众多围基中,受水患影响最大,也是历来水灾最为频繁的地区。

清中叶以后,由于下游沙田的开发,水患对海舟堡一带的影响更显严重,据称:“其李村之基曾经甲辰、甲寅两度冲缺,李村修筑已竭,经营以强弩之余,当滔天之势,是以溃决较他处更宽,而修筑亦较他处更难。念此溃决之际,坟墓田庐,多被冲没,乡村老稚,亦被淹浸,稻粮百植,牲畜池鱼,尽遭漂荡,以及往来搬移,船只转运,白日墟市全无,昼夜宵小抢攘。所糜费者,奚止百十万金,而流离失所,种种祸害,何可胜言。”^①甲辰、甲寅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九年(1794)。大水两度将李村基冲决,李村围内田地、人畜、稻粮、池鱼等皆遭其祸,“种种祸害,何可胜言”。

为预防和对抗水患,因而有了专门的基围经管人。据称,桑园围“东西两基向皆归附近业户经管,该处有基分者谓之基主业户,而附基之海利杂息亦归经管之基主所得,其基即责成经管之基主保护修筑,各堡皆有派定基段分管保修”。^②即基主业户负有经管某一基段的义务,而该基段“附基之海利杂息”则归基主所得。基主业户实则桑园围一种普遍的维护基围的制度。

综合相关文献,清代海舟堡内的基围分为李村基、麦村基和三丫基三大段,据载:

李村(基),李继芳、李复兴、李高、梁税祐、黎、余、石七户经

① (同治)《桑园围总志》,卷1,《甲寅通修志》,第39—40页。

② (光绪)《重修桑园围志》,卷11,《章程》,第11页。